
浙江经济的自组织特性与内生缺陷

李杰伟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本文考察了浙江经济自组织特性和内生的缺陷。发现浙江经济是一个自组织系统，有很强的适应性。但是却存在内生的缺陷，如人格化交易，政府权力的扩展和重商文化的消失。这些都需要更多的分析。

【关键词】浙江经济；自组织；人格化交易；重商文化

一、引言

浙江经济的发展历来受到大家关注，并且作为浙江模式被广泛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就不免被强加各种要求，认为某些方面不符合经济规律云云。然而，仔细分析现实就会发现，浙江经济是在本土资源禀赋、文化观念上发展起来的，类似于哈耶克所说的“自组织系统”，因而有其自发的适应性。但是，这样的经济在发展中不免会打上原有文化、交易方式、政府等的烙印，从而也会有各种内生的缺陷。

二、自组织特性

浙江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原生型的经济，这种经济模式是在本土资源禀赋、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兼有当地政府的配合，因而有很强的生命力，能够适应经济的变迁，推动制度的变革。因而，很多我们常常认为的浙江模式的缺点，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缺点。有些是其他大环境不足时，民间经济为了适应环境（交易成本）而做出的变革。温州、台州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最典型的如“挂户经营”，一旦国家体制发生变革，交易成本减少，风险变小，挂户经营即迅速减少，开始以股份合作制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加以取代。而有一些，是在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各种条件限制的情况下的特殊时期，经济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环境发生变化时，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如大家常说的浙江经济产业层次低，急需产业升级。我们看看浙江经济的环境和国际环境。第一、整个国家来说，土地市场都是很不完善的，因而在经济发展初期，土地这种长期对区域经济最大限制的生产要素价格是非常低廉的，甚至只是几十元一亩，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强求企业要集约地使用土地。第二、我国初级劳动力的供给是非常充裕的，因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很有竞争优势，对促进就业也很有好处。企业无论是为自己利益考虑还是部分出于国家压力，在绝大部分产业上（因为总有一些行业是需要技术或资金密集的）都会选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第三，国际环境上，人民币虽然已经迅速升值，但是仍然是低估的，这对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维护也是很有好处的。第四、就中国整体而言。前几年，资源并不是短缺的。直到2004年才开始资源短缺，电荒、煤荒才开始出现，浙江企业就开始迅速调整。技术的提升明显加快。第五、浙江绝大部分企业规模不足，资金有限，只能通过购买设备、模仿等简单的方式积累技术，而无法自己开展研发。而我国打击仿冒、保护专利的力度并不是很大。在浙江这种产业集聚明显、亲友之间纽带联系紧密的地区，研发的外部性非常明显，每个企业的研发成果很有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迅速被一大批企业模仿。这对于企业来说，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是不理性的。但是笔者2007年在永康调研时，发现永康2005年资源紧缺之后，开始着力保护专利，严厉打击仿冒，以提高技术。随即有很多企业大幅提高研发投入，达到占销售额的2.83%，并在两年之内达到一百多项专利。因而，综合起来分析，在浙江经济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幅投入资本而技术研发投入不足，因而产业看似低下，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都是企业理性的选择，而并不应该作为一个经济模式的缺陷。同时，由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企业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宏观或者中观的环境：生产要素的价格要市场化，以反映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同时一些高级的生产要素国家要

提前供给（如高级技术工人、研发人员，与国家教育制度有关，企业或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培养出大片技术工人、研发人员），从而使这些生产要素有很大的供给弹性，以保证企业能够迅速地转换生产模式。在各种内生的缺陷克服之后，在扭曲资源配置的环境改变之后，在市场缺陷、政府干预失灵克服之后，这种原生型的经济能够自发地做出调整，我们不必太在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

三、内生的缺陷

1. 人格化交易

人格化交易主要是以阿夫纳·格雷夫为代表的“历史制度分析学派”中所用的一种现象，即马格里布商人在远途贸易时，往往只从马格里布商人中挑选代理人，并以联盟内部的多边声誉机制来维护这种交易制度。后来为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及其学生所引用，用来分析浙江经济尤其是温州经济模式中的一些情况。他认为，温州人格化交易兴盛。并以此为基础，对温州经济中（可以作为浙江经济的代表）的几个现象加以分析：1、产业的“代际锁定”；2、政府与企业一起织成一张不可知的网，阻碍投资者的进入；3、温州人满世界跑，不得不通过大规模海外移民的方式来撒开生意网。

但是我认为，其中也有一些分析并不妥当，产业的代际锁定方面，虽然人格化交易使后来者进入传统行业更为容易，从而出现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但是浙江现在与外界交易很广，对产业的选择路径依赖并不是很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企业这几年也在不断地向相关的行业扩展，永康几年之前还只有几个传统行业，想在已经有八大行业数十个小行业了，义乌产品的创新速度更是让人惊叹。相关行业的集聚很大程度上是产业集聚、信息交流所引发的进入成本和经营成本降低引起的。而温州人通过海外移民来撒开生意网，其中有人格化交易的原因，但更多的，我认为是俱乐部经济的原因，他们相互照顾，因为俱乐部经济内部存在更高的收益，甚至是规模报酬递增，加上积累循环效应，俱乐部经济就会越来越大。这一点王春光对巴黎温州街和北京温州街的考察论述得很清楚。

然而，政府和工商界相互联合，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阻碍外来投资者的进入与人格化交易关系很大。这种相互之间的合作，应该是对于经济社会利益的一种博弈的结果。但是一旦这些战略中对各种关系的不同的预期形成以后，他们就变为“文化信念”并且超越了他们所得以产生的博弈。“他们超越了原来的博弈在于他们可以影响对于游戏规则和组织发展过程的外部变化的反应，换句话说，他们成为和游戏相关的一个文化因素。即我们所说的关系，族亲、同乡总是好于别人，总要相互照顾，这是超越经济利益的。这种人格化交易，在改革开放初期，使得当地政府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默许和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对浙江经济的崛起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这种人格化交易的发展，更多的地方政府官员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沦陷”为这一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果是公共权力与私营经济两者不断地相互渗透，形成了一张区域性的“不可触摸的网”，阻碍着浙江各个地区的对外开放。进一步看，政府官员介入人格化交易方式，在产权保护等方面，造成了政府在对待本地人和非本地人、甚至区域内有关系和没关系的人上亲疏有别，导致外来资本无法进入、民间资本大量外流。

背后的原因有两个：

（1）人格化交易中，政府对待民间资本的亲疏有别是有很深的文化根源的。尤其是族亲氛围很盛的时候，对于同族或者同乡的照顾要远远高于外族或者外地的商人。这种照顾往往是超越经济利益的。这样一来，就会超出经济的边界，最终是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有这样一张网，本地人就可以更加容易地找到各种关系，从而在本地立足、发展。这里所获得的利益就会大大超越市场经济规则中所应得的利益，同外地资本相比，他们的利益就大大超越了。这样一来本地资本所获得的利益就会高于外地资本，资本就不再是自由流动了，本地收益率更低的资本投资之后也能获得同外地收益率高的资本获得相同收益，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当地的资本收益率。更多的外来资本不会在本地投资。本地没有关系或者累于关系的人也不会在本地在再投资，最终引起本地资本不足和资本外逃。

(2) 在人格化交易中, 政商两届很容易形成利益集团。一种经济的发展, 因为利益集团的存在, 即使没有那么多有利的经济, 只要是有利于经济体所有者和公职人员, 那么公职人员同样会促进其发展, 甚至打压好的经济。造成最明显的“寻租”现象。这样一来, 对整体经济而言就是不利的。公职人员在制定公共政策, 或者执行公共政策时, 应该是以整体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 但是利益集团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一来, 我们的制度设计就要使公职人员既使利益集团最大化, 又朝着公共利益最大化走着。但是这种内生的人格化(有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交易天然地会使公职人员(政府官员)和某些经济体结成利益共同体, 当政府改革没有进行好的时候, 这种环境就会使公职人员做有益于共同体的事, 有可能违背整体利益, 甚至大大违背整体利益。而环境也会允许他们这样做, 千百年传统使老百姓觉得这是正常的事情。

2. 重商文化的消失与文化的延续

浙江自古有重商文化, 到晚清时期, 文化传统中重工重商重教的因素已经固定下来, 这些因素非常类似与韦伯意义上的“新教伦理”, 虽然对于财富追求的愿望, 不如新教伦理, 但是也能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说, 这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所在。

这一轮经济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恶劣的环境所引起的, 恶劣的环境和经济的放开激起了大家奋斗、追逐财富的心理, 激活了重商的文化。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生活慢慢富足之后, 如果没有一种新的动力, 追逐物质财富的冲动就会逐渐减弱。如果商业文化中没有新的动力, 重商文化也就会慢慢淡化。这种新的动力可以来自于对新教伦理中对财富的无尽的渴望; 可以来自于富裕的生活对更多人的激励——这方面现在很好, 可以来自于自我实现的动力和对家庭走向富裕和荣耀的责任感; 也可以来自于工商阶层的一种荣耀和地位上的尊重, 或者是富足之后合适地用钱(支配财富)带来的一种价值的实现所引起的福利的提高和自我的实现。最关键的是要给工商人士以地位上的尊重。他们自己也要能够创造并维护这种荣誉, 如果极端重利, 生活腐化堕落, 文化层次、趣味低下, 那么社会上是不会给他们这种荣誉的。

但是很不好是, 这些追逐财富的动力, 现在有逐渐消失的迹象, 反而是那些并没有富起来的人, 由于富裕生活的对比所激起的斗志, 似乎有更加强大的动力。而另一方面, 工商界人士在生活、文化上, 并没有相应地提高, 反而更加腐化堕落, 这点, 可能身在其中的人会有切身的感受。这样也大大削弱了商人地位的提高, 弱化了重商的文化。如果现行的重商主义文化没有通过商业活动得到加强, 或者没有通过媒体、书本知识得以固定下来。那么追求物质财富为荣的社会风气将会逐渐减弱。追求财富也不会成为一种价值体现而被大家从内心深处得到认识。那么整个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将会慢慢消失。这是最致命的。浙江人现在拼命往政府里挤就说明已经开始出现苗头了。

3. 政府权力的兴起

在浙江, 尤其是中南部, 入仕并不是最荣耀的事情。因为当地土地非常稀缺, 如果不外出经商, 甚至有可能养活不了家里人。在这样的背景下, 外出经商、做手艺的人地位很高。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政府权力开始变大, 收益也相应增加。重商文化也就开始悄然变化。现在重商文化的淡化和仕族文化的兴起, 与政府权力过大有很大关系。政府权力过大之后, 第一, 更多优秀的人会涌向政府。中国自古有官本位的文化。即使现在, 当官在沿海还是要好于经商。而企业的经营难度加大之后, 经营人员也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向政府, 更加强化了这种趋势。民间的这种风气是随着环境而改变的, 现在政府里工作比较好, 就会往政府里挤。当这种长期预期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风气, 减少经商的后备人才。而现在, 更多学习好的人也不愿意经商办厂, 一般都是学习不好的人在做。第二, 经营难度加大, 经商的激情就会减少, 而追逐进入政府会成为风气, 很多企业的老板现在已经千方百计让子女进入政府部门了。这样, 重商的文化就会大大削弱。这就需要进行政府机构的改革。在很多关键部门逐步削弱政府过高的权力, 使得政府能够公开公正地行政; 改革挑选的竞争机制, 削弱过高的政府福利, 在政府中形成竞争的环境。

四、结论

浙江经济是在特殊的资源禀赋和商业文化上发展起来的，是当地人民为了改善自身生活，利用一切资源创造财富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而有很强的自组织特性和适应能力。但是也存在各种缺陷，最主要的就是人格化交易和重商文化的消失。这些与原有的文化观念，政府权力的扩张有关系。需要不断地改革创新，才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 [1] 陈建军：中国高速增长地域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M].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2] 冯兴元：市场化——地方模式的演进道路[J]. 中国农村观察，2001，1.
- [3] 史晋川 金祥荣 赵伟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M]. 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 [4] 史晋川 汪炜 钱滔 等：民营经济与制度创新：台州现象研究[M]. 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 [5] 史晋川：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J]. 浙江社会科学，2004，2.
- [6] 王春光：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J]. 社会学研究，2000，3.
- [7] 王春光：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J]. 中国社会科学，1999，6
- [8] JAIME ROS.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M].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